# 京派小说与道家之因缘

Jingpai Xiaoshuo Yu Daojia zhi Yinyuan

冯晖◎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京派小说

与现实之困境

# 京派小说

## 与道家之因缘

Jingpai Xiaoshuo
Yu Daojia zhi Yinyuan

冯晖◎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派小说与道家之因缘/冯晖著．—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668-0265-1

Ⅰ.①京… Ⅱ.①冯… Ⅲ.①小说研究—北京市—当代 Ⅳ.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0055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8620）85221601
营销部（8620）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邮购）
**传　真**：（8620）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650mm×980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43 千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29.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
# “京派小说与老庄美学之亲缘关系新探”
# 结题成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京派经历了从当代学术视野的边缘化到受到重视以致成为一门“显学”的历程。京派在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成为学界的关注重点，有其必然性。京派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就有对它的评论与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段时期过于注重政治因素，京派在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处于缺席状态。“新时期”以来，文坛生态环境发生改变，一大批曾经被边缘化的现代文学作家与理论家开始浮出历史地表，这之中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凌叔华、林徽因、卢焚、朱光潜……随着这些曾经在学界和文坛享有盛名的人物进入当代文学史家与批评家的视野，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派别成为研究对象就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发现京派是一个全面地进行中西、古今文化融会思考的学派，不仅肯定了其文学与学术价值，更将其作为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时代语境中探索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的美学、文艺学的典型个案，以期获得我们“自己的声音”。京派小说是京派取得极大成就的文体之一，它最显明的文本品质，是对老庄所开创的审美的文学传统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做了打通的工作，实现了流派自己的美学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成为“纯文学精神”的象征。研究京派小说如何接受、阐释与消化老庄美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建设所力倡的“激活传统文化、彰显现代价值”的历史大语境里，显然是一个富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命题，能够给本土化与世界性交汇融合的对话空间提供厚实的经验和深刻的启思。

## 一、关于京派研究的历史梳理与本书的研究对象

从现有史料来看，吴福辉应该是开创了京派研究的滥觞。1982年他发表《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试论“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一文，主要论述了京派作家和“左联”青年作家作品里的讽刺艺术。该文仅是对京派的一个初步探讨，还有一些史实问题未能厘清，如重点论述老舍，把老舍当作京派小说家中的重要一员。而对于废名和沈从文，则是一笔带过，未作深究。并且，从该文对“京派作家”的定义“所谓京派作家，习惯上指的是现代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在30年代继续活动于北京及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包括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作家群”，可以看出此时对京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迷雾之中。[①]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获得学界的公认，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学术现象。1985年出版的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已提到京派与海派之争，但是黄修己认为：“从创作来看，则京派未必能成为流派。”[②] 而同是1985年出版的由钱理群等人共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则旗帜鲜明地认定京派为一个文学流派：“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平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③] 及至1988年，杨义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里，已将“‘京派’作家群与上海现代派”作为一整章来论述，且把沈从文、凌淑华、萧乾等视为京派代表作家，并进行了深入分析。1989年，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出版，专列“京派小说”一章，全面阐述了京派小说的形成、发展和

---

① 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该文涉及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不过主要探讨的是老舍这位他所认为的京派小说家的讽刺艺术，对沈从文却是简单的几笔带过。吴福辉在以后的文章里有所订正，认为老舍不属于京派作家。这说明当时他对京派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把京派小说与“京味”小说有所混淆。

②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页。

③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艺术特点。严家炎指出："如果说京派在散文和诗歌方面的代表是周作人、俞平伯、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理论方面的代表是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李长之，那么，它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就是废名、沈从文、凌叔华、林徽因和萧乾。四十年代出现的汪曾祺，则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京派的文学传人。"① 与其他研究者相比，严家炎不仅详细开列出了京派的成员，而且对京派的源流作了一番切实的考察。自此，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取得了稳固的文学史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对京派研究的拓展，一个主要的表现是关于京派的分期问题。集中起来有两种看法。一是以高恒文为主的认为 1937 年 8 月以后《文学杂志》的突然停刊，标志着京派的终结；② 一是以吴福辉、杨义、周仁政等为代表的认为 1947 年 6 月《文学杂志》的复刊标志着京派在抗战胜利后的再起。③ 笔者同意后一种看法，因为即使从京派文学自身的影响与师承的关系来看，京派的活动在 1937 年后也没有结束，经沈从文一手培养出来的汪曾祺就是明证。

本书研究对象是京派小说与道家哲学、美学思想之间的因缘，主要考察京派小说在文学主题和美学意蕴上与道家的渊源关系。笔者综合严家炎和吴福辉（见其《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对京派小说家成员的看法，结合本书的研究论题，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废名、沈从文、凌叔华、卢焚和汪曾祺五位京派小说家。其中，卢焚是吴福辉等人所认可的京派小说家而没有进入严家炎的研究视野。而萧乾和林徽因是几乎所有研究京派的学者都认可的京派小说家，本书却没有将之纳为研究对象。原因是：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确实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萧乾和林徽因接受过道家美学与人生哲学的影响。也许是笔者有所疏漏，求待诸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①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6 页。

②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4 页。

③ 分别见吴福辉：《京派小说选·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杨义：《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6 页；周仁政：《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海口：海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二、京派小说的研究历史、现状及本书的补白与深化

应该说，京派从被当代学术视野边缘化到受到重视，以致成为一门“显学”，确实是一个比较迅速的过程。而且，相对于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和文学理论诸方面均取得颇高的艺术成就与社会影响而言，学界对京派小说的研究是最为厚实的。从单篇文章到厚厚的专著，从作家个案的论述到整个流派同人的研究，从题材主题的探讨到美学风格的挖掘，从文化意向的阐释到哲学追思的探询，可谓研究愈来愈细致、愈来愈深刻。

1982 年，吴福辉发表《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试论“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文中初步论及后来被称为京派小说代表作家的废名和沈从文。自此，学界对京派小说的研究就蓬勃发展起来。综观 20 世纪 80 年代到当下的京派小说研究状况，就题材研究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 关于京派小说的乡村题材研究

吴福辉于 1987 年发表的《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京派小说选前言》开了先声。该文主要分析了废名、沈从文、卢焚、汪曾祺等人的作品，得出结论：“京派作家主要写的是农村”，“京派甚至不能说只是表现北方的，进入他们文学视野的，正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一个‘乡村中国’！”① 自此以后，废名的湖北黄梅、沈从文的湖南湘西、卢焚的中原村落、汪曾祺的苏北高邮，就一直是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类文章非常之多，在此不予赘述。就京派小说的题材范围来说，笔者在本书里所讨论的，也主要是其“乡村中国”里所体现出的主题、人物气质、文化意蕴等方面与道家美学的源与流之关系。

2. 在京派与海派的比较研究中凸显出京派小说

由于京派的命名是与海派分不开的，诸多学者就把京派与海派

① 吴福辉：《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京派小说选前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 年第 4 期。

置于一个共时的语境中来谈论与比较。海派的主要成就是小说，故作为比较对象的京派也就集中于京派小说这一文体。吴福辉1987年发表的《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是较早的一篇。他认为在题材方面，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分别描述的是“乡村中国和都市中国的人生聚象”；在美学表现方面，“京派的审美体验偏于纯情、蕴藉；而海派追求的是逆反曲折的多变力度，追求驳杂新奇”。①

随后，李俊国有《“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一文，主要从三个方面研究了京派与海派的不同：首先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了京派与海派由不同的“文化形态”所导致的不同的“文学分野”；其次是以历史的态度辨析了“上海气”与“北平风度”；最后分析京派与海派作家审美意识的不同：“上海作家受制于都市旋流的推涌，表现出求新鲜、突兀、奇巧的审美风尚，北平作家恪守京城的风度，表现出重和谐、‘节制’与‘恰当’的审美意识。”②

王爱松1994年的《从文化影响看“京派”与“海派”的自然形态》，也讨论了京派小说的风采。该文与上述李文意思接近，但也自有亮点，就是把周作人、废名与沈从文三位大家从文化影响角度来进行比较。这是学界首次把周作人也放到京派与海派的比较研究中。③

此后对京派、海派比较研究作出了重要的、集大成式探讨的学者，应该非杨义莫属。1994年，杨义出版专著《京派海派比较研究》，1996年又发表论文《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2003年又有《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一书面世。④ 杨义研究京派与海派的“两书一文”对以前的京派与海派研究均有所超越，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与结论。如他从文化人类学（包括地域文化学）

---

① 吴福辉：《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学术月刊》，1987年第7期。

② 李俊国：《“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

③ 王爱松：《从文化影响看“京派”与“海派”的自然形态》，《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④ 分别见杨义：《京派海派比较研究》，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杨义：《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海南院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杨义：《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角度，对孕育京派与海派的地域文化母题和各自命名的由来都进行了历史的考证及追根溯源；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辨析京派与海派各异的文化背景来源和审美情趣。杨义将他对京派与海派的研究方法概括为“现象还原”和“文化定位”。[①] 这是值得后来者借鉴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学武的《各具异彩的文学景观——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比较论》，对表现在京派与海派小说中各自独特的中国现代社会人生体验、情感模式、文化意味和艺术创新都作了深刻的论述。[②] 海派小说与本论题关系不是很大，故在文章中没有涉及。但是，笔者认为，对海派小说的全面认知是必须的，可以深化对京派小说的独特审美风格的理解。

3. 关于京派小说的都市题材研究

随着对京派小说研究的拓展，研究者发现，京派小说家除了创作优美、恬静的乡村小说外，还把笔触对准了现代大都市，创作了诸多都市小说。而且，京派的都市小说是作为他们抒情诗的、散文化的乡村小说的对立面出现的，鲜明地体现了京派小说家“乡下人”式的爱憎态度。按照发表时间顺序，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有：张鸿声的《与乡村对照中的都市》、王爱松的《都市的五光十色——三十年代都市题材小说之比较》、刘淑玲的《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及《象征与反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③] 主要结论是：京派的都市题材小说是笼罩在京派小说家的乡村梦影里的，用都市生活的堕落、虚伪及其对人性的异化，来衬托与强化他们心中乡村的安宁、本真、优美与自然；与京派作家对乡村生活的熟悉相比，作为都市的“外来者”，他们对都市的观照缺乏动态的历史审视，这导致笔下的都市生活与都市人生都是单调的、一元的，嘲讽式的揭露多于深

① 杨义：《京派海派综论·论文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② 文学武：《各具异彩的文学景观——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比较论》，《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③ 张鸿声：《与乡村对照中的都市》，《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王爱松：《都市的五光十色——三十年代都市题材小说之比较》，《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刘淑玲：《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河北学刊》，1995年第6期；刘淑玲：《象征与反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人的同情和理解。由于探讨京派小说的重要主题“人性真，人情真”的需要，本书也必须对京派的都市题材小说透彻掌握，以建立一个比较视野来研析京派的乡村题材小说。

4. 关于京派小说的儿童题材研究

京派小说家多有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如废名、凌叔华、沈从文、萧乾、汪曾祺等。而且凌叔华有段时期还致力于儿童生活情状的描写，并结集为《小哥儿俩》出版。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里，就稍稍论及了“以儿童生活为题材，表现和讴歌童真美”的此类京派小说。[①] 张慧敏的《京派小说的童真特色》一文在列举诸多京派的儿童题材小说后分析指出，京派小说共同的特色之一是对童心世界的描述与向往，京派小说的散文性结构与孩童的思维特色相契合。[②] 刘进才的《京派小说诗学研究》一书则专列一节“儿童视角叙事”，以沈从文、萧乾、凌叔华三位作家为例，研究京派以儿童生活为叙述中心的小说，认为描写儿童，礼赞童真，是京派作家共通的创作特色。[③] 其他对单个作家的儿童题材小说研究的文章也不少，如刘帆的《关爱儿童不失单纯——也谈废名创作》、刘海军的《童心：沈从文的审美心理》。[④] 本书也重点研究了京派以写童真、童趣为主题的小说。

总体来说，上述诸多研究与本书的相关章节甚有联系，但是研究角度与研究目的则有着根本的不同。上述研究侧重的是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而本书的切入点，则是从京派小说与老庄这一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的渊源关系入手，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老庄美学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审美品格的生成。

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是学界孜孜不倦地探讨的另一重要话题。

---

①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9～230 页。

② 张慧敏：《京派小说的童真特色》，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 年 4 月 7 日第 2 版。

③ 刘进才：《京派小说诗学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 分别见刘帆：《关爱儿童不失单纯——也谈废名创作》，《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6 期；刘海军的《童心：沈从文的审美心理》，《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研究视野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考察京派小说所表现出的中国古典审美传统；一是把京派小说置于西学东渐这一现代性的大语境里，考察其艺术风格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对京派小说的“现代性”色彩的研究，也就是研究京派小说家所受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在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写作技巧”与“现代性心态”，例如意识流、蒙太奇、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等，因为本书没有涉及，在此不予细述，仅列出一些相对重要的文章：严家炎的《京派小说与现代主义》、史书美的《林徽因、凌叔华和汪曾祺——京派作家的现代性》、游友基的《京派与现代派的遇合——汪曾祺早期小说论》,[①] 等等。

结合本书的论述内容，笔者重点介绍了学界在“京派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典审美传统”这一研究脉络里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在对京派小说艺术特色的“民族性”表现的研究中，李德的《论京派抒情小说的民族特征》是较早的且论述较深刻、全面的一篇，发表于1988年。该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京派小说的民族特征：“描绘具有民族特色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塑造具备传统美德的人物形象”，“借鉴民族文学的传统艺术技巧”。[②] 在李德看来，京派抒情小说的民族特征主要传承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仁者爱人”式的儒家美学。

严家炎则认为京派小说“着力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把写实、记梦、象征熔为一炉，使抒情写意小说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总体风格上的表现是“平和淡远隽永”。严家炎没有追溯京派小说这些艺术特点表现的传统资源，但是行文中的偶尔一两句，例如认为“在废名那里，由于对哲学的研究，对庄子思想的研究，

① 分别见严家炎：《京派小说与现代主义》，《文艺述林》（第2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史书美：《林徽因、凌叔华和汪曾祺——京派作家的现代性》，《天中学刊》，1995年9月增刊；游友基：《京派与现代派的遇合——汪曾祺早期小说论》，《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② 李德：《论京派抒情小说的民族特征》，《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

他作品中‘人与自然契合’，神往甚至陶醉于大自然的倾向”，[①] 可以说表明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默认京派小说的美学风格来自于道家哲学与美学的影响。

杨义认为京派小说家“以质朴而雅致、绵密而潇洒的笔触，点画出古老的中国城乡儿女，尤其是带原始静穆感的乡村灵魂的神采，神与物游，物我无间，创造出具有东方情调的、和谐浑融的抒情境界。”[②] 从这里的用语可以看出杨义将京派小说的美学表现视为道家一脉。事实上，杨义也论述了道家文化对京派文学的深刻影响：“京派作家在动荡时世中多多少少带有一些隐逸味道，徘徊于《庄子》所谓的‘游方之外者’和‘游方之内者’之间，体现了某种淡泊宁静、渐近自然的人生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流派的作家大多喜欢陶渊明，这与他们某种潜在的道家情趣不无关系。”[③]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陶渊明被视为道家文化精神的代表。杨义既指出了京派作家具有隐逸倾向的时代原因，又指出了他们所具有的潜在道家情趣从而接受了道家的传人陶渊明。

文学武的看法则是：京派小说的美学风貌是“追求一种平和淡远的艺术风格，语言清新，隽永，抒情色彩浓厚，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审美心理上受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制约，和谐、匀称、恰当等是其最高的美学理想和追求”。[④]

与上述把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表现或归于儒或归于道不同，刘保昌在《京派小说与传统文化》一文中则认为其与儒和道都具有深刻的关联。“京派小说家在文化观念上，显然与中庸式的文化传统多有共通之处”，所以京派小说独特的文学个性是“精致和谐，温馨柔美，匀称含蓄，冲淡悠远”。这显然是将京派小说的美学风格纳入儒

---

①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7 ~ 239 页。

② 杨义：《杨义文存》，《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4 ~ 365 页。

③ 同上，第 627 页。

④ 文学武：《各具异彩的文学景观——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比较论》，《文学评论》，1998 年第 4 期。

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另一方面，刘保昌又认为京派小说是诗化叙事，这份艺术特色则“与‘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美学相沟通”。①

学界对京派小说的“意境”表现也非常关注。李晓宁的《京派叙事态度与小说文体》一文先从京派小说具有绘画特征谈起，由于文字的描述具有绘画性，故文本中充满了“清幽的意境”。这与“京派作家是以倾向传统，以静观态度观察世界”的审美心胸密切相关，“因而小说里充满了纯净、清澈、宁静的诗情画意的构质”。②文学武也认为京派小说讲究内在的韵律及注意对意境的创造，意境模式构成了其文体表现功能的重要特点：“京派小说常常运用意境的不确定性和空白性”，“去追求超越时空的完美艺术境地。”③ 这些文章都对京派小说中的意境表现作了具体细致的例析，但是，对于京派小说何以能以“意境”作为最主要的艺术特色表现，以及京派小说家何以能创造诗情画意般的“意境”，则搁置不论，未作深入的源流研究。

综上，在对京派小说艺术特色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整体研究中，有两个主要看法：一是认为它与道家美学有很深的渊源，一是认为它与儒家美学关系密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者一般认为京派小说的艺术表现与儒、道美学都有关系，只是其持论是侧重于儒还是侧重于道。当然，也有研究仅仅说明了京派小说的艺术表现来源于传统文化、传统文论，将之奠定了一个“传统”底子后，就一笔带过，不予细究。

对京派小说家进行个案研究的文章与论著都非常多，以沈从文位居第一，废名与汪曾祺则可谓是平分秋色，凌叔华、萧乾、卢焚、林徽因等又次之。这里就不细述了。

就笔者的管见，迄今为止对京派小说的整体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

① 刘保昌：《京派小说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第 6 期。

② 李晓宁：《京派叙事态度与小说文体》，《吉首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

③ 文学武：《京派小说的文体特征》，《学术月刊》，1998 年第 11 期。

第一，从研究思路上而言，对京派小说的研究还主要遵循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建立的路子：一是偏重于社会学分析方法，揭示京派小说的文化、主题内涵；一是偏重于艺术审美角度，揭示京派小说的美学风格。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京派小说，但是仍然没有脱离思想加艺术的二元模式。研究思路的突破应该是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从原型批评、文学人类学批评等研究方法入手来观照京派小说与道家美学的关联，是想有意识地弥补这种缺憾。

第二，对京派小说家的研究用力不均，聚焦点还是中坚人物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讨论的作品主要是其代表小说，作品涉及范围有狭小之嫌，而且往往忽视了京派小说家自己的文学观和创作观，惯以京派理论家的文学观来映证京派小说中的美学表现。女性主义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在中国大陆兴起，却鲜有研究者以女性主义理论把凌叔华和林徽因置于京派作家群中进行系统考察与辨析，这应该是可以深化对京派小说的文化品格与美学品格的研究的。本书研究了京派小说家的“回忆”文学观和“梦”文学观的美学意义，这应该是一个补白。而且本拟从女性主义角度考察凌叔华的小说特色与素有“女性哲学之称”的老子哲学及美学的关系，但是由于笔者思考的不成熟，暂时未能实现，希望日后能有所进展。

第三，在整体上研究京派儿童题材小说的还不多见，即使在文章中涉及也大都是将之纳入京派小说的“人性美，人情美”这一总主题下，对京派的儿童题材小说所独具的美学意义还不是很明晰，也没有在哲学与美学高度上论述其与传统文化的渊源。本书研究了京派以儿童为题材的小说与老庄的“复归于婴”这一文化原型和美学原型的因缘关系，认为它们的本质是道家哲学意愿上的“反朴归真”。

第四，在对京派小说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中，诸多研究者都从各个角度，如京派的文化观念，京派的审美心理，京派小说的人物塑造、诗性化叙事、自然景物描写、意境表现等等，谈论了其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吸收以至创造性转化。但是，这些结论并不是建立在将京派小说的艺术表现与道家元典或儒家元典以及它们各自在中国古代文学、美学史上的发展变迁结合起来论述这一基础上的，而

大多是进行简单的、任意的“对接”，是一种直线性的因果描述，给人语焉不详之感。本书在细读京派小说文本与《老子》、《庄子》的基础上，又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方法证明京派小说家在对《老子》与《庄子》接受的基础上，从京派小说的文本内容与美学表现两大层面上，刨根究底地追寻出京派小说与道家思想的深刻因缘。本书立足于此前的相关研究，即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意义上的作家作品、流派研究这一基础上，将之提升到传统与现代之关系、因缘的文艺学和美学高度的研究，呈现出道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审美品格形成的价值和意义。

京派小说家属于“五四”的第二代、第三代作家，不像鲁迅等文学前辈一样处于新旧文化激烈尖锐的冲突中，由于文学革命原因而对传统文化持偏激态度；他们大多处于北京，北京中古文化积淀深厚，是一个具有闲适情调的城市，且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是一个政治气氛沉闷而文学气氛相对宽松的文化态势。这使得京派小说家与“五四”一辈作家相比，有更加平静与理性的心境来看待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欣赏与评审的自由，从而有可能发现传统文化的合理处与优长处，继而在小说创作中承传传统文化的精髓。若把京派小说放到文学发展的长河里，无论是将之与此前的乡土小说相比，还是与同时的海派小说和左翼小说相比，以至与此后的七月派小说相比，都可见出它最显明的美学特色是对传统文化的接纳以及将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京派小说做了打通的工作。京派小说中恢复与表现的文学传统，在笔者看来，主要是老庄所开创的审美的文学传统，而非孔孟一脉的载道的文学传统。本书着力探讨京派小说与道家美学之间深刻的因缘关系，以期达到以下三个目标：

1. 反映出现代文学在东西方文化资源选择上的变化

谈及现代文学，学界注重的往往是它受西方文学思潮、哲学、美学的影响，以及对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反叛。确实，在现代文学草创之初，理论家、作家们更多的是借鉴外来文化资源。而当现代文学走过它的狂飙突进的青春期后，逐渐理性起来，一面继续接受欧风美雨的滋养，另一面也开始注重利用本土深厚的传统资源。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